



MA RI SHI BIAN

马日事变

湖南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现代史研究室

62.89

湖南人民出版社

马日事变

湖南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现代史研究室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长沙

马日事变

湖南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印张：1 5/9

统一书号：11109·102 定价：0.15元

目 录

- 一、马日事变前的政治形势…………… (2)
- 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活动…………… (11)
- 三、马日事变…………… (26)
- 四、十万农军围攻长沙…………… (37)
- 五、血的教训…………… (45)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中，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这次事变是在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刻，由隐藏在革命统一战线里的地主豪绅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发动的一次反革命军事叛乱。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拒绝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在事变发生前不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事变后又阻止了十万农军围攻长沙、反击反革命政变的英勇斗争，致使敌人的阴谋得逞，革命力量遭到巨大损失。

“马日事变”是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合流的反革命信号，是两湖地区革命形势由高潮到低落的转折点。今天，回顾“马日事变”这一血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正确地进行现实的革命斗争，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

* 旧体诗韵把马字和𠂔字同韵的字列在上声第二十一韵，以𠂔字为这一韵的韵目。后来发电报时，将二十一日简称为“马日”。所以湖南这次反革命政变被称为“马日事变”。

一、马日事变前的政治形势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和中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各革命阶级实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了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国革命加快了步伐。一九二五年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掀起了遍及全国的反帝斗争怒涛。一九二五年七月成立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国民政府，随后建立了国民革命军。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的北伐战争，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援，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国民革命军就击败了数倍于自己的吴佩孚、孙传芳等反动军阀部队，占领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半个中国。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

工农群众支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又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

各省工农运动风起云涌，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

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充分显示了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到一九二七年春，湖南有组织的工人发展到四十万，湖北发展到四十五万，安徽、江西、江苏等省的工会组织也迅速发展，很多地区爆发了空前未有的政治、经济斗争，并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一九二七年一月，英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进行武装挑衅，枪杀中国工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工人阶级奋起斗争，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据点。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的、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南工人阶级，团结各界革命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对英经济绝交运动，接收了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与窝藏反革命分子的湘雅医院和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收回了帝国主义长期把持的湖南邮务管理权和长沙、岳州海关，使帝国主义在湖南的侵略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上海工人阶级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军，先后进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周恩来同志总结了前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然后亲自率领上海工

人，经过激烈的战斗，解放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上海，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这前后，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革命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到一九二七年一月，仅湖南农民协会的会员就达二百万，农会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人。农民群众向地主豪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把几千年封建统治打得摇摇欲坠，把豪绅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使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并迅速建立了一种使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梭镖队。在革命武装强大的地方，地主阶级的武装大部分投降农会。农民群众还进行了减租减息、批判宗法制度、改变旧风俗旧习惯等方面的斗争，开始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农民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了。

帝国主义者眼看自己所支持的封建军阀纷纷垮台，自己所依靠的封建势力土崩瓦解，他们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于是改变手法，勾引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动分子，从内部破坏革命。这时，窃取北伐军总司令职务的国民党右派头子蒋介石，通过他在赣州、九江、安庆等地疯狂镇压工农群众和革命分子的暴行，显示出

了他的反革命手段，成为帝国主义理想的代理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当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一方面用军舰炮轰南京，以武力胁迫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一方面会同上海大资产阶级拿出一千五百万银元供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活动的经费。蒋介石在帝国主义、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全力支持下，于四月十二日对上海工人阶级实行血腥大屠杀，惨遭杀害的工人达三百余人，被捕的五百多人，失踪的五千余人，很多优秀的工人领袖和共产党员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上海的工会组织也都被摧毁了。这就是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蓄谋已久的全面叛变革命的开端。接着，南京、广州、杭州、福州等地的反动派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月十八日，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蒋介石成立了代表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的革命政府相对立。

为了彻底消灭革命势力，蒋介石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四川军阀杨森、广东军阀李济深等，对武汉地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内部的一切反革命势力也随着蠢动起来。帝国主义者关闭了他们在武汉的

工厂、银行、企业，武汉的很多资本家也怠工、关厂、停止贸易和抽走现金，使武汉地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从农村逃亡到武汉、长沙的地主豪绅，散布什么“湖南共产了”，“兵士六个月不回家，老婆要离婚另嫁”，“某军官家里被抄”等等谣言。他们将兵士寄回家的饷银全部没收，盖上私刻的农民协会图章，反诬“农会没收了官兵寄回的饷金”，妄图以此煽动北伐军官兵同农会对立。北伐军中的许多反动军官，本来就是地主豪绅，他们参加北伐军只不过是进行政治投机，因而当农民运动即将把地主阶级葬入坟墓的时候，他们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于惶恐之余，便处心积虑地阴谋从内部搞垮革命。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们更是蠢蠢欲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虽然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从革命的全局来看，还只是局部的失败。武汉革命政府仍然管辖着湘、鄂、赣三省七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得到蓬勃发展的有组织的工农群众的全力支持，在北伐军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表示拥护革命政府。而蒋介石这时虽然占据了闽、浙两省和苏、皖两省的江南部分，得到两广和四川军阀的响应，但是他能够率领的主力部队并不多，加之，为他们所收编的旧军阀部队的战斗力既弱，内部又矛盾重重，反动统治极

不稳固，因而不可能发动对武汉政府的全面进攻。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对当时整个局势作了全面的分析，坚决主张深入开展工农运动，进行土地革命，广泛地武装工农群众，尽快地扩大我党直接掌握的军队，向蒋介石反革命势力猛烈进攻，把革命引向前进。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湘、鄂、赣三省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蒋运动。四月十四日上午，长沙工农商学各界举行十万人的反蒋示威和铲除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会上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散全省团防武装”，“普遍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口号，并当场处决了大劣绅俞诰庆。在武汉举行了三十万人的反蒋示威大会。这时，武汉的大工业和手工业几乎全部成立了工会，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已从争取集会、结社、罢工自由发展到建立工人武装，参加政权建设。武汉工人纠察队发展到五千人，拥有三千支枪，执行着逮捕和镇压反革命、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对于一些资本家歇业停工的厂店，则由工会接收，办起合作社来。在农村中，反对土豪劣绅，抗租抗粮的斗争更加如火如荼，特别是湖南农村的斗争更为激烈，许多县农民协会接管和夺取了团防局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击败地主武装的进攻，打击和镇压那些罪大恶极、破坏农运的大土豪劣绅，进一步巩

固了农村政权；部分地区的农民协会自动起来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一场土地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到一九二七年五月，湖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迅速发展 to 六百万人，占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广大工农群众在反蒋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威力，大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国民党左派更加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早在一九二七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同武汉政府闹对立的时候，党就联合何香凝、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提出了反对独裁，实行民主，提高党权，发展工农运动的方针，并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撤掉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四一二”后，在群众的反蒋高潮中，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决定免去蒋介石的本兼各职，并通电讨蒋。这时隐藏在武汉政府内部的国民党右派，慑于群众运动的威力，都不敢出来公开活动。

以上情况说明，党如果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办事，壮大革命力量，武装工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打击蒋介石和隐藏在武汉政府内部的反动势力，是完全可以克服时局的逆转，取得新的胜利的。

但是，在这革命的关键时刻，党内陈独秀的

右倾机会主义已发展为一条完整的投降主义路线。陈独秀一贯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并且极力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在“四一二”政变前夕，当蒋介石和国民党假左派头子汪精卫在上海密谋策划反共的时候，陈独秀竟与汪精卫发表所谓国共两党领袖的“汪陈联合宣言”，公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作辩护，把当时已经是洞若观火、十分明显的蒋介石反共阴谋活动说成是“谣言”，是“误会”，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国共两党“如兄弟般亲密”等等，从而麻痹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的革命警惕性，对反革命暴动放松了精神上的准备和组织上的防卫。“四一二”后，革命形势紧急，党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提出了加强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民政权的正确主张，并把他在年初在各省农民协会联席会议上提出并经讨论通过的普遍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提交大会讨论，同时还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陈独秀坚持投降主义立场，实行家长式的统治，不仅横蛮地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而且还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的表决权。会上陈独秀又抛出了一个所谓“革命扩大论”，把扩大革命和加深革命对立起来，用所谓继续北伐“扩大革命”来反对实行土地革命。当时蒋介石正企图打

着继续北伐统一中国的旗号来达到巩固他在东南各省反动统治的目的，“革命扩大论”就在实际上迎合了蒋介石的反动意图。大会对陈独秀的错误虽然进行了一定的批评，制定了一个在乡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民主政权，维护工农利益的决议，但由于这个决议是不彻底的（例如，南方各省的小地主很多，而决议的“农民政纲”中却提出“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这就不能满足广大贫农的要求），大会又没有制定贯彻这一决议的具体政策，加之陈独秀仍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因而没有能够在实际上纠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陈独秀变本加厉地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对资产阶级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方针，惟汪精卫的马首是瞻。汪精卫叫嚣如再搞土地革命就要“依法惩治”，陈独秀就曲从其意，主张土地的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革命分子、反动军官和有重大民愤的劣绅的土地），国民党提出旨在制止农民夺取乡村政权的所谓农村自治时，他也深表赞同。这样，实际上就取消了农民革命这个最紧迫的有关革命全局的根本问题。

陈独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严重地挫伤了工农群众的革命锐气，助长了反革命的威风，导致了两湖地区反革命叛变的发生。

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活动

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加紧进攻革命和陈独秀变本加厉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情况下，隐藏在武汉政府内部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认为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时机已到，便加紧了他们的阴谋活动。

这时的武汉政府被汪精卫所控制。汪精卫是一个反动政客。大革命以来，他把自己打扮得“左”而又“左”，骗取了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名声，在孙中山逝世以后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后，他被蒋介石排挤出国，蒋汪之间虽有着争权夺利的矛盾，但在反共反人民

^{*}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指使其爪牙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中山舰到了黄埔，蒋介石马上诬陷李之龙擅入黄埔，系有“异动”，诬指共产党“阴谋暴动”，于三月二十日逮捕了李之龙，扣留了中山舰及其它船只，并调动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所，扣捕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这是蒋介石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的罪恶活动的开端，史称“中山舰事件”。

方面却是一致的。因此，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时，马上电召汪精卫回国。四月初，汪精卫回到上海，当即和蒋介石、吴稚晖等人举行秘密会议。吴稚晖骂他投降共产党，他痛哭流涕地说自己也是反共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会上，他们达成了“清党”反共，取缔工农武装等反革命协议，并决定：蒋介石负责沪宁方面的大屠杀，汪精卫负责破坏武汉革命政权。四月九日，汪精卫来到武汉，本想立即动手，但“四一二”以后，武汉政府所辖湘、鄂、赣等省的工农运动仍在继续开展，并且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虽有反共之心，却无反共之力。于是，他继续施展政治投机的惯伎，伪装得比谁都革命，高喊着“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等响亮口号，欺骗人民，在陈独秀投降主义者的帮助下，很快地攫取了武汉政府的领导权。他一上台，就采用各种方式向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献媚。四月，他明令取缔一切“排外行动”，退还被人民群众接收的帝国主义的教堂和所谓慈善机关，禁止长沙工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罢工。五月，又连续颁布反动训令，限制工农运动，制止工人的“过度”要求，严禁工人纠察队活动，甚至强行解散支持工人运动的汉阳国民党支部。他和地主豪绅一个鼻孔出气，

诬蔑农民的革命行动“无异反革命”，扬言“乡里公正及丰裕之户”（实即土豪劣绅）皆在国民政府保护之列，命令各级政府严禁土地革命。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汪精卫在武汉破坏革命，蒋介石在南京加紧行动。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一天，蒋介石就曾密令包括武汉地区在内的北伐军对“已克服各省，一致实行清党”。这时更加加紧对武汉政府进行颠覆活动。他除了勾结黔、鄂、川、粤各省军阀进犯武汉外，还派出大批特务潜入武汉政府统治区内，煽动武装叛乱。四月二十日，天津《益世报》披露，“蒋介石密令唐生智讨伐武汉方面的共产党”。对武汉政府所属部队的反动军官，蒋介石更是信使往还，极力收买拉拢，策动他们发动军事叛变。这样，两湖地区北伐军中那些投机革命的反动军官，在蒋介石、汪精卫的唆使下，便加快了策动武装叛乱的步伐。唐生智统辖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就是直接策划“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

何键，一八八七年生于湖南醴陵。少年时期，曾在封建地主办的私塾和清末顽固派代表人物王先谦在长沙主办的崇古学堂读书，满脑子孔孟之道，怀着要继承“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事业”的反革命野心，还有一套纵横捭